

法国传教士倪德隆在四川藏区活动考述

胡 晓

提 要：法国传教士倪德隆在四川藏区生活 60 余年，先后在巴塘（Batang）、磨西面（Mosymien）、打箭炉（Tatsienlou）传教，担任西藏教区代牧主教达 35 年之久，为天主教在藏区的传播做了很多工作。他在传教生涯中历经多次教案，在藏区举办了文化教育事业，有一定的历史影响。

胡晓，女，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南交通大学政治学院讲师。

主题词：倪德隆 四川藏区 传教 教案

倪德隆（Pierre—Philippe Giraudeau），法国人，1850 年 3 月 17 日出生于法国南特，20 岁投身教会事业，26 岁晋铎，此后的一年时间在南特教区的一所神学院任教（collège Notre Dame des Couets）。1877 年 8 月 9 日他加入巴黎外方传教会，一年考察期满后，于 1878 年 7 月 11 日出发前往西藏教区。在一段长时间的旅行之后到达打箭炉（Tatsienlou，今四川康定），从此开始了在四川藏区长达 60 余年的传教生涯^①。国内关于天主教藏区传播史的研究颇丰，却鲜有人关注这位青年时期即来华，曾领导天主教藏区传教事业 35 年的传教士^②。本文拟收集中西文献档案资料，对倪德隆在四川藏区的活动作一系统考察，以弥补国内研究之不足。

一、倪德隆在四川藏区活动的背景

（一）天主教在藏区的传教经过

1846 年罗马天主教教宗额我略十六世（Gregory XVI）将原属印度亚格那代牧区（AGRA）的西藏地区划出成立专门的传教区，隶属巴黎外方传教会。1847 年，巴黎外方传教会派遣罗勒拿（Charles René Renou）从四川进入巴塘（Batang）做进入西藏的准备。1856 年，西藏正式成立宗座代牧区，在川东传教的杜多明（Jacques léon Thomine—Desmazures）成为第一任宗座代牧主教。1857 年，西藏教区与川西北、川东南教区商定并明确各主教区界限，西藏教区管辖西藏、康属及上川南南部地区的一半（除去

邛州、大邑、穆坪和天全州东部）及下川南的仁寿、井研 2 县。

1860 年，中法《北京条约》签订，传教士取得进入内地传教的权利。1861 年，罗勒拿和肖法日（Jean—Charles Fage）通过法国驻北京代表得到了在藏区传教和进入西藏的批准。后因藏人的袭击和西藏地方政府的阻扰，1864 年天主教从西藏撤出，转向西藏东部边缘地带即属于四川省和云南省行政范围的藏区传教，在四川省清溪县（今汉源）化林坪设立主教府。同年，吴依容（Houillon）驻打箭炉，巴布埃（Augustin—Etienne Bourry）被派往巴塘，此后又有古特尔（Jean—Baptiste Goutelle）在打箭炉设立教会，原云南主教丁盛荣（Joseph Pierre Chauveau）^③被任命为西藏代牧区主教。1865 年，进藏的传教士全部被赶出西藏，丁盛荣遂决定驻打箭炉，西藏教区的主教府也由化林坪迁至打箭炉。巴黎外方传教会西藏传教会的主要活动重心至此转移到四川藏区，打箭炉、巴塘是传教士活动的两大中心。^④

（二）天主教在藏区传教的有利及不利因素

1860 年《天津条约》明确了外国传教士在内地传教的合法性，四川藏区虽远离中央政府，但仍属清廷管辖，因而这一地区的清廷官员对天主教大多采取了保护政策。1906 年法国在成都设立总领事馆，使法国在四川的政治势力大大增强，天主教在藏区的地位也有所提高。

然而相对有利因素而言，天主教在四川藏区

的传教工作具有更多的不利因素。除了要面临与内地传教相同的困难外,传教工作在藏区受到很多束缚。首先是地形的限制,藏区各主要传教点之间路途遥远,如巴塘距打箭炉便有1230里的距离^⑤。路途中布满无法预测、频繁变化的地势和河流,以及似炮弹引擎无法逾越的峡谷,尤其某些地区抢劫、掠夺等犯罪活动非常猖獗,使得传教士很难离开自己传教的区域。与主教驻地联系的唯一方式,同时也是最常用的方式是书信,打箭炉主教的消息需要1个月甚至40多天的时间才能到达茨菇(Tsekou)、巴塘和小维西(Xiao Weixi)等地。其二,传教士们的传教方式必须与藏区拥有众多民族这一文化特点密切相关。因为不同的语言和风俗,一个传教地点的改变则意味着传教方式的改变,这对传教士把握少数民族语言、饮食习惯、宗教习俗等方面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其三,四川藏区虽不同于西藏,但仍然受到藏传佛教的极大影响。藏传佛教具有严密的宗教组织,庞大寺院经济,并确立了“政教合一”与活佛转世的独特统治制度,进一步强化了佛教的社会性,影响决定了藏区民众的信仰、道德行为乃至整个社会生活。宗教的排他性使得天主教极难在这一地区立足。最后,近代以来川藏边地屡次发生社会动乱,也使天主教传教工作受到很大影响。

二、倪德隆在四川藏区的传教活动

(一) 巴塘传教

1878年底倪德隆到达打箭炉,不久即被派往巴塘传教。巴塘,地处四川西部,毗邻西藏昌都地区。四川在此设军粮府和都司,但巴塘的社会风俗、宗教等均受西藏影响,外人也将其视为藏地。作为内地入藏的交通要津,1863年即有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巴布埃来此传教,在城郊四里龙修建教堂和住房,发展藏民入教。1866年巴塘发生了民众驱逐传教士、捣毁教堂的第一次巴塘事件,1873年巴塘又一次发生打毁教堂事件,民众“初则掷石向击,继则伤害抢掳,后则奋斧将教堂拆毁”^⑥,同时波及到盐井、莽里地区,当地民众将两教堂焚毁,传教士逃往康定。

倪德隆初抵巴塘的时候,情况似乎有所改善。在传教士德告丹(Auguste Desgodins)受主教丁盛荣委托写给巴黎外方传教会总部的年度

报告中,这样描述1878年巴塘传教点的情况:“1866年在巴塘修建的三座建筑,在1873年的骚乱中遭到毁坏,最近这些建筑差点又遭受同样的命运。只是在中国政府的干涉下才得以幸存。盐井(Yerkalo)、Bong-mé和巴塘传教点的处境仍然困难。但中国官员表现得很亲切,民众也不仇视我们。只有拥有权势的喇嘛仍是我们势不两立的敌人”(Rapport 1878)^⑦。而1879年巴塘“显得很平静,喇嘛们也没有那么仇视天主教,传教士们看到了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中国人皈依天主教的希望”。(Rapport 1879)

可惜年底却发生了喇嘛持械反对匈牙利伯爵贝拉等赴藏事件,此事引发了一系列后果:1880年2月,西藏地方政府致信巴塘地方官,谴责其容忍传教士的行为;3月,西藏地方政府颁布了一项重要声明,声明发布到西藏各地,所有汉地以及拉萨管辖范围以外的所有藏传佛教寺院,内容是反对欧洲人,尤其是传教士,声称要将其赶出去^⑧;不久爆发一场针对藏区外国人的武装冲突,巴塘的法国教会首当其冲。适时巴塘教会下辖巴塘,盐井,Bong-mé三个传教点,倪德隆驻盐井,负责盐井和Bong-mé的教务。当西藏军队驻扎在江卡时,倪德隆被告知西藏军队将在两三天后到达巴塘,而有一支小分队将进入毫无防卫能力的盐井。Bong-mé,盐井两地的天主教徒于是聚集到倪德隆的住所寻求保护,他们中的一些人背着小孩和行李,在磅礴大雨中赶了两三天的路程。倪德隆将这些天主教徒紧急疏散到云南边境上的一个村庄,可惜云南方面也传来了不利消息。正在坐以待毙之际,西藏方面突然撤军,众人喜获得救^⑨。倪德隆将这次获救归因于上帝的庇佑。(Rapport 1880)

盐井每年新入教者很少,而现有教徒如果敢于公开信仰,也会面临被主人或喇嘛剥夺田地和住所的威胁。毕天荣(Félix Biet)主教^⑩认为,西藏传教会没有足够的财力为教徒提供经济上的帮助,(Rapport 1884)导致传教士的宣教工作进展缓慢。1881年,巴塘和盐井等地爆发天花瘟疫,仅巴塘一地就有超过400名喇嘛死于天花。几名天花病人得到传教士的救治而康复,一些小孩接种了牛痘,倪德隆认为这是一次行善和回应喇嘛仇恨及诽谤的机会。果然,即使当年9月发生了梅玉林事件^⑪,盐井仍增加了27名新的慕道者。“这个数字对其他天主教社区来讲无

关紧要，可在盐井却相当令人欣慰，因为要使这一地区的民众信教非常困难。”（Rapport 1881）此后，倪德隆意识到慈善行医在传教过程中的重要性。他曾在众人眼前用圣水医治了一个被魔鬼附生的青年，这次偶然事件使得一些人接受了洗礼（Rapport 1883）。一个名叫 Songuié 的教徒临终前一直受到倪德隆的照料，他希望儿子能够受洗，改掉以往的陋习，原来顽劣的儿子受主的感召突然变得十分孝顺，令目睹这一切的众人对天主教产生敬仰（Rapport 1884）。

1885 年，主教毕天荣计划建立一个新的传教点以连接巴塘和盐井。倪德隆在亚海贡（Yar-egong）受到民众的欢迎，这个地区在巴塘和盐井的中间，到两地均需步行 3 天。倪德隆强调，在亚海贡设立传教点不仅可以使从巴塘前往盐井传送物品和圣餐的传教士避开强盗出没的途径，还可以使从巴塘到云南阿墩子教堂的距离缩短（Rapport 1885）。在 1887 年巴塘事件之前，新的亚海贡传教点已经建立起来。修建了三个房间，10 名教徒已经准备好收获他们种植的庄稼（Rapport 1887）。

（二）磨西面传教

1887 年巴塘事件之后，倪德隆逃回打箭炉。1891 年，他被任命为副主教。之后被指派到磨西面（Mosymien，今泸定磨西）和常神父（Paul Clélestin Grandjean）一起工作。磨西面传教点隶属泸定沙坝教堂。倪德隆赴任之前，磨西面已经有一个传教士的住所和一所小的礼拜堂。

磨西面的第一批天主教徒是 30 年前从穆坪逃难来的。其中一个信教家庭里母亲早逝，父亲疏于对孩子的教育，导致孩子们不再信仰天主教。倪德隆认为应该加强信教家庭中孩子们的教育。他和常神父商量，送了 4 个女孩去沙坝学习。而男孩则留在磨西面的小学，这些接受了天主教教育的孩子可以教其父母教理和如何祷告，倪德隆的计划取得了成功。一个六岁小女孩开始教她的母亲做功课。（Rapport 1892）

1893 年磨西面的慕道者人数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增多。这令人满意的方式是：慕道者大多是年轻人，对宗教充满热忱。倪德隆重视教徒的素质胜于教徒人数，他认为教徒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很多教徒从未受过教育，一些教徒素质低下，甚至吸食鸦片。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尽量吸收年轻教徒，并给予他们受教育机会。

1895 年新建的天主教小学已招收 28 名男孩和 16 名女孩（Rapport 1895）。一些虔诚的教徒家庭聚集到磨西面，方便他们的孩子接受教育，从而远离鸦片和帮派组织。这一年，倪德隆还劝说了一名头人皈依天主教。在当年毕天荣主教写的年度报告中，指出磨西面即将成为藏区最好的天主教社区之一。（Rapport 1893）

磨西面虽然靠近内地，受喇嘛教的影响较小。但当地民众仍然对天主教充满戒备。1894 年 6 月，当地民众与天主教徒产生纠纷，倪德隆立即将此事诉诸公堂，最终传教士胜诉，5 名当地民众交了罚金，并在全村人面前向教徒道歉（Rapport 1894）。但这次事件后，倪德隆深知藏区民众敏感而自尊，天主教必须低调行事，而他在传教时也更加谨慎地处理与不信教民众的关系。

1895 年总理衙门同意传教士收回在巴塘及云南阿墩子等地的产业^⑥。6 月 4 日，倪德隆前往打箭炉准备就此事与打箭炉和巴塘汉官协商。在他抵达的第二天，成都发生教案的消息即传到打箭炉。打箭炉全城戒严，只有持通行证的人才能出入。8 天以后，倪德隆才得以出城。他先回到了沙坝办事。在得知磨西面的教堂可能被打毁的消息后，6 月 21 日他又返回打箭炉请求官府保护磨西面教堂。6 月 24 日，一名宣教者写信告知他教堂被毁的消息，他寄了一些救命钱回去，因为打毁教堂的人甚至抢走了教堂人员的衣服。不久，打箭炉的局势得到控制。7 月 6 日，打箭炉官厅派了一队士兵和一位代表护送倪德隆回到磨西面。他清点教堂的损失，获得了第一批赔偿，安抚教徒，并从官方处得到保护教堂的承诺。但是教堂的重建工作却需要相当长的时间。（Rapport 1895）

（三）打箭炉传教

因为在藏区 22 年的良好表现，1901 年毕天荣病逝之后，倪德隆被任命为西藏教区代牧主教，驻打箭炉。1901 年至 1936 年，倪德隆主教职期间，历经中国社会变迁和川边动乱，传教工作受到很大束缚。

世纪之交，中国人民长久堆积的怨恨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发生。自 1900 年 12 月，四川西部的一部分教会陷入困境：沙坝（Chapa），冷碛（Lentsi）和磨西面的教堂遭劫。法国驻成都领事安迪（Pierre-Rémi Bons d'anty）在四川

总督处活动的结果仍然只能让倪德隆签署一份令总督满意的协议^③。四川高级官员中对外国人持敌视态度的人增多,西方势力在辛丑条约中要求了巨额赔款,这也增加了地方官员对传教士的不满。

1904年英印军队开进拉萨,英国在西藏的势力日盛,这使得清朝中央政府比过去更加重视川边地区的管理。1905年4月,川边地区发生“巴塘之乱”,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及其随员五十余人被杀,此事牵连各地天主教堂,西藏天主教会势力因此大受打击。事件平息之后,清政府任命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

1908—1911年间,赵尔丰在川边推行“改土归流”^④,为了让改土归流顺利实施,边区民众不受外来影响,赵尔丰视传教士等外国势力为改革的障碍。1909年,巴塘和打箭炉的两名官员对天主教会极不友善。巴塘的那名官员处置了三名新教徒,且不允许其为自己辩护。这两名官员是赵尔丰的亲信,倪德隆因此断言正是赵尔丰指示他们采取一切可能打击天主教。(Rapport 1909) 1910年西藏发生暴乱,清政府借口不能保证在川边外国人的安全,要求在京的各国大使承诺3年内阻止其国人进入西藏。天主教在藏经营历数百年而无功,教区徒具虚名,罗马教廷鉴此决定取消西藏教区称号,成立以康定为中心的西康教区,下辖康区、锡金、云边,以便加强在川滇藏区的教务活动。这一年,倪德隆感觉到招募新的宣教者非常困难,神学院也招不到学生,四川教区想帮忙,但是“四川的年轻人都没有足够的勇气舍弃他们富饶的家园来到荒凉的边区”(Rapport 1910)。

1911年辛亥革命后,驻防川边汉军发生混乱,纷纷离队回家,达赖十三使藏人驱逐汉官,藏军进攻川边地区。各传教点陆续受到威胁,打箭炉总堂遭到藏民、盗匪甚至当地驻军的抢劫。1912年,倪德隆在 tongolo 找到一个可靠的藏身之所,于是将方济各会的修女、修院的修生、孤儿院儿童、女校的学生疏散到那里。10月30日,倪德隆同另外几名传教士回到打箭炉,领事安迪已经在此等候他一天。主教得知藏军将进攻川边地区,又马上下令带回修女和学生,形势危急,藏区民众已经收到西藏地方政府的正式命令要对付汉人和欧洲人。tongolo 持续恐慌,到处是流浪者,妇女和小孩躲到山里,只有几个

老人留下来看家。倪德隆写信给素有交情的西藏土司 Min-Tchen-Se,后者装着不知道倪德隆将修女等安置在 tongolo,下令为主教的逃亡队伍提供运输的牲畜。在安迪的帮助下,打箭炉官方又派出一队百余人的护卫队,众人终于得救。(Rapport 1912)

1914年,驻乡城川军营长陈步三发动兵变,杀死旅长稽廉,率军直趋打箭炉,镇守使张毅弃城退守泸定桥。几乎所有的民众、教徒及传教士立刻逃离了打箭炉,因为担心离开后教堂的命运,倪德隆向陈步三写信请求其保护教堂。几天以后,后者的军队占领了城市。为了自己的名声,陈同意保护留守的两名传教士。接着的几天,这两位传教士被任命为陈与四川派来的和谈代表之间的调解人。但是调解失败了,陈决定将两位传教士作为人质,安迪要求四川政府支付赎金以换取两位传教士的自由。这一要求被拒绝,法国的外交交涉没有起到作用^⑤。

1917年藏军再次入侵川边,想把边区并入“大云南”的唐继尧及图谋扩大统治范围的四川军阀使局势更加复杂,法国驻华公使在京奔走,希望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施加压力,保护边区传教士,但北洋军阀政府已无力号令混战中的军阀。各传教点不时遭受中国军队、藏军和盗匪的敲诈。巴塘、亚海贡、理塘(Litang)一度被藏军占领,倪德隆对教务显得忧心忡忡,他希望混乱的局势早点结束,因为这是极不利于传教工作的。

1920年,倪德隆前往成都会见教务巡回使光若翰。这一年,天主教“西康教区”更名为“打箭炉教区”,又称“康定教区”。1926年,康定教区教徒人数首次超过5000,达到5018人。“相对于教区成立的时间来讲,这个数字微不足道,但是相对于传教士们在这一地区所遭遇的困难来讲,这个数字令传教士们感到欣慰。(Rapport 1926)”因为除了边区混乱的政治局势外,不断发生的旱灾、饥荒、瘟疫也阻碍了边区的传教工作。

1927年,华郎廷(Pierre sylvain valentin)^⑥被祝圣为主教。成都主教骆书雅(Jacques Rouchouse)主持了祝圣仪式。边区局势未稳,为了不引起民众注意,避免发生民教纠纷,这次仪式尽量简化,没有奏乐,甚至连教堂的钟声都和平时一样。第二年,年近80的倪德隆便让华郎廷

接手教务,不过直到1936年,倪德隆在庆祝自己晋铎60周年的仪式上才正式将康定教区主教的权力移交给华郎廷,而自己则隐居在打箭炉。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用来默祷,直至1941年11月13日去世。

值得一提的是,倪德隆任主教期间在藏区举办了大量文化教育医疗事业,这些措施推动了藏区的文化卫生事业,同时使天主教在藏区的社会地位提高。倪德隆还深入地研究过康藏历史文化。他编撰的《拉丁语—藏语语法》共388页,1909年在香港出版;《拉丁语—藏语词典》共698页,1916年在香港出版;《法语—藏语口语词典》共600页。他选译了25个拉封丹的寓言故事,结集成藏文版《拉封丹寓言故事》于1933年出版。另外他还为修道院的学生编写过藏文教材。

三、倪德隆经历藏区多次教案

近代川藏滇边外国教会的势力较其在内地的势力更为弱小,然后这一地区却频发教案,且教案的程度更加激烈,教案爆发的原因,参加的阶层也更加复杂。倪德隆在此传教60余年,经历多次教案。现选择1887年和1905年的两次巴塘教案为例,看倪德隆在教案发生时的活动。

(一) 1887年的逃亡

倪德隆入巴塘后,短短几年时间即经历了几次考验,直至在1887年的巴塘教案中,最终逃出巴塘。

巴塘教案的导火线是1886年的“马可伦(C. Macaulay)事件”^⑧,此次事件再次引发西藏政府对欧洲人的抵抗,拉萨三大寺给天主教各传教点附近的喇嘛寺发布命令,要求其永远赶走传教士。

1887年6月,在巴塘喇嘛民众中就流传着一本小册子,宣告几天以后巴塘5个区的人们将聚集起来驱赶欧洲传教士。凭借着法国政府和中國政府签发的传教护照,倪德隆和苏烈(Jean Andre Soulié)坚持留在巴塘。7月15日夜晩,大约15名喇嘛民众袭击了senelong的天主教社区。7月19夜晩,二十几名手持武器的喇嘛民众从河对岸来到教堂,发动攻击。

教堂大门很快被火枪击中,倪德隆和苏烈从教堂的屋顶跳到副土司家的院子里,副土司之前并没有保护他们,但是也不愿看到他们被杀。于

是将他们藏一个阴暗的房间里,在这里他们呆了36个小时,期间只有一个酥油饼果腹。之后他们在一队士兵的护卫下转移到正土司家中,不过正土司家中也并不安全。一名汉官来访,要求传教士离开巴塘。倪德隆和苏烈认为他们的传教得到了中国皇帝的许可,他们没有犯罪,有权留在巴塘。但巴塘地方官已经不能控制局势,不能为传教士提供保护。最后在得到可以重回巴塘传教的承诺后,倪德隆等同意暂时撤离巴塘。

1887年巴塘教案后,天主教会和法驻华公使向总理衙门提出交涉,至1895年,总理衙门始同意传教士收回在巴塘及云南阿敦子等地的产业,并由川、滇两省各赔银2万两。护送教士、教民返回。1896年,毕天荣回国养病,指定倪德隆负责教区教务。这期间为了巴塘教务,倪德隆曾派牧守仁(Henri Georges Mussot)去四川总督驻地成都,希望得到主管宗教事务官员的支持,可惜四川官方置身事外,牧守仁无功而返。1898年,倪德隆和苏烈等回到巴塘重建巴塘教务。当地官方希望他们不再追究喇嘛等的责任,并放过捣毁坟墓的人^⑨。土司、头人也前来道歉。倪德隆最终答应了这一要求。不久巴塘、盐井等地又发生喇嘛迫害天主教徒事件,倪德隆只得转而寻求法国驻成都领事和法国驻华公使的帮助。(Rapport 1898)

(二) 处理1905年巴塘教案

1903年英国武装入侵西藏以后,西藏上层统治集团的分裂主义倾向日趋严重,川边藏族地区的形势顿行紧张。针对这种形势,清政府于1904年10月令驻藏帮办大臣凤全经营巩固川边地区。倪德隆相信清政府在西藏加强统治的措施将为传教士打开自由的新纪元,他试图从中国政府处获得在西藏传教的权利,作为回报,主教建议传教士务必运用其影响为中国政府争取拥护其统治的西藏人民,但巴塘事件的发生破坏了他的计划^⑩。

凤全在巴塘裁汰喇嘛,垦殖荒地,因操之过急,与当地僧俗形成尖锐的对立。1905年4月5日,凤全及随行部众50余人被杀,喇嘛民众先后焚毁巴塘地区法国教堂3处,杀死法国传教士牧守仁、苏烈,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巴塘事件。事件发生后,川督锡良急命提督马维骥率大军“进剿”,并委建昌道赵尔丰“办理炉边军务”,以为声援1905年7月底清军攻入巴塘,杀死喇嘛及

民众多人，焚毁丁宁寺，处死巴塘正副土司。

1906 年，倪德隆前往巴塘，提督马维祺对倪德隆相当礼遇，甚至让自己的士兵给主教行礼。赵尔丰效仿马提督，给予主教周到的接待。起初倪德隆很担心这次旅行，马、赵的表现令他放心。锡良委派赵尔丰与倪德隆谈判善后，但两人并未达成最后协议。主教巡视了巴塘、盐井教务，留下常神父重建盐井教务，而自己于 11 月 30 日返回打箭炉。12 月 13 日倪德隆来到成都，就巴塘事件与总督直接商议，法国驻成都领事馆的 Hauchecorne 先生给予他很多支持。（Rapport 1906）领事安迪在北京总理衙门处活动，在安迪和倪德隆的双重压力下，清政府只能以赔偿，道歉了解此事：“教堂、教民房产、什物各项赔款定义，共赔银四万四千五百两，……两教士命价并修建墓碑，议立养教院，一切在内共银七万八千五百两，二共一十二万一千五百两”^②，所赔偿的银两“分期由打箭炉茶关兑付”。清政府还赏给倪德隆三品顶戴。

结 语

长期以来学界对倪德隆未做过研究，究其原因，一是中文资料的匮乏；二是倪德隆只是众多来华传教士中普通一员。然而，他既在藏区传教 60 余年，又曾担任天主教藏区主教达 35 年之久，在天主教藏区传教史上自有不言而喻的重要地位。对他的研究，既可了解清末民初天主教在藏区的传教概况，也可窥知彼时藏区与西方的交流。

（责任编辑：林庆华）

① Notice bibliographique de Giraudeau, Archives des missionnaires des MEP/EDA, N. 1378.

② 倪德隆，1901 年—1936 年任西藏教区代牧主教。

③ 丁盛荣，1864—1877 年任西藏教区代牧主教。

④ 天主教西藏传教史请参阅：秦和平《近代藏区天主教传播概述》，《中国藏学》1991 年第 1 期；徐君《近代天主教在康区的传播探析》，《史林》，2004 年第 3 期；房建昌《基督教在西藏传播小史》，《青海社会科学》1988 年第 2 期；董莉英《天主教在西藏的传播（16—18 世纪）及其影响——兼论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西藏大学学

报（汉文版）》2004 年第 3 期；王永红：《略论天主教在西藏的早期活动》，《西藏研究》1989 年第 3 期；房建昌《西藏基督教史（上）》，《西藏研究》，1990 年第 1 期；房建昌《西藏基督教史（下）》，《西藏研究》1990 年第 2 期；刘君《康区外国教会览析》，《西藏研究》1991 年第 1 期。

⑤ 清代“自打箭炉至里塘 8 站，计程 685 里。自里塘至巴塘 6 站，计程 545 里”，黄沛翘《西藏图考》，记打箭炉至巴塘站程。共 14 站，1230 里。

⑥ 《法国公使热福理照会中录打箭炉教方来信》，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第 3 辑，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第 1031 页。

⑦ Rapport annuelle des évêques de Thibet 1878, archives des MEP/EDA. 下文引用 Rapport annuelle des évêques de Thibet（西藏主教年度报告），均以文中注释年代的形式标出，如 Rapport 1879，不再单独列在参考文献内。

⑧ 泽拥：《法国传教士与法国早期藏族文化研究》，《中国藏学》（北京）2009 年第 2 期，第 105 页。

⑨ 丁宝桢：《藏人驱逐洋人派兵弹压保护片》，《丁文诚公遗集》奏稿卷 19，第 14—15 页。

⑩ 毕天荣，1878—1901 年任西藏教区代牧主教。

⑪ 1881 年 7 月 15 日传教士梅玉林（Jean Baptiste Honoré Brioux）在从巴塘前往盐井的途中被土匪劫杀。

⑫ 这是 1887 年巴塘教案的遗留问题。

⑬⑭⑮ Aude BIELLMANN, “L’Influence Missionnaire Française dans Les Marches Tibétaines”, dans Jacques WEBER, La France en Chine (1843—1943), Nante: presses Académiques de l’ouest; ouest Editions, 1997, pp. 108—118.

⑯ “土”，即土司制度中的“土官”，一般来说，由少数民族的首领出任，有土宣抚使、土千户等职；“流”，指“流官”，则由中央政府派来的可以流动的官员出任。改土归流，即把原来的土司废除，设立地方行政机构，由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来直接治理此地。

⑰ 华郎廷 1936 至 1952 年任打箭炉教区主教

⑱ 1886 年，以英印政府秘书马可伦（C. Macaulay）为首的使团从哲孟雄（锡金）进入西藏的康巴宗（班禅的范围），宗本（地方长官）阻止他前进，双方在康巴宗相持了数月。中英关于缅甸的条款签订以后，英印政府即将马可伦从西藏康巴宗撤回，暂时停止入藏“考察”。

⑲ 1887 巴塘教案中，喇嘛民众捣毁了传教士梅玉林的墓以及附近天主教徒的墓。

⑳ 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第三所：《锡良遗稿（奏稿）》第 1 册，北京：中华书局 1959 年版。